

# 第一章 具有反帝传统的 广东工人阶级

## 第一节 英殖民主义者对我国 领土香港的侵占

广东位于我国南方，北依五岭群山，南临浩瀚大海，是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海岸漫长，海岛星罗棋布，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重要地方。广州古称番禺，早在秦汉时期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年来在广州出土的秦汉时期的文物中，便有不少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器物。1974年在广州市文化局院内发现的秦代古船台遗址，估计可造宽6—8米、长达30米、载重50—80吨的木船。汉朝时，广东对外交往已远至印度半岛东南部的黄支（今印度康吉弗仑）和已程布（今斯里兰卡）。汉朝以后，广东对外贸易继续发展。广州呈现“客商如云，货物如山”的盛况。唐朝时，广州有“蕃坊”之设。这

是当时为方便外侨管理而设的外国侨民聚居点；并设立有“广州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宋代继续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的外贸管理体制。元代著作《南海志》等，列举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可见当时我国，特别是广东对外交往所涉及地方之广。

兴旺的对外贸易和交往，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商品化的农业亦有长足的发展。例如丝织品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珠江三角洲等地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南海、顺德一带出现了以种桑养蚕为主的专业化生产基地。明代广东社会经济继续有较大发展，对外交往与贸易方面也相当兴旺。

但是近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和对外关系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转折。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极力向世界各地进行掠夺，寻找和开拓新的殖民地市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发展缓慢的古老中国，视为掠夺和宰割的重要对象。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发动了卑鄙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在西方列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强迫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广东首当其冲，成为我国最早受到外国侵略的一个省份。

在 1842 年 8 月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的《南京条约》、翌年又被迫签订作为《南京条约》附约的《虎门条约》

中，广东乃是深受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之害的地方之一。例如：广州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的五个口岸之一（其余四个为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被勒索赔款；粤海关丧失自主权；被迫割让土地（香港）；被迫开设租界（广州沙面后被设为租界），等等。

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猖狂侵略中国过程中，夺取香港，便是其蓄谋已久的严重步骤之一。

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濒临南海，是一个常年不冻的深水良港，地位优越，交通便利，扼亚洲、非洲、欧洲交通的要冲，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香港岛及邻近小岛面积共 78.37 平方公里。香港地区，即包括香港岛、九龙及新九龙（面积 37.05 平方公里）、昂船洲（面积 0.75 平方公里）、“新界”（本土）面积 736.16 平方公里）和“新界”（离岛）（面积 211.10 平方公里）等地，合共面积 1069 平方公里。历朝以来，香港地区都是置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明万历年以前，香港属广东东莞县管辖，后改属新安县（后改称宝安县）管辖。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便已在香港一带活动。据香港考古资料统计，在香港地区已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各达数十处。出土文物表明，它与广东大陆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1955 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地方发现了一座古墓（命名为李郑屋村古墓），一些墓砖上刻印有“大吉番禺”、“番禺大治历”等文字，表明当时香港地区是归番禺所管治的。墓中出土文物还表明，当时香港地区农业生产已达一定

水平。唐朝时，屯门（今“新界”青山湾）是一个天然避风良港，当时驻有军队，史称“屯门镇”。凡有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的，必先聚集屯门，然后才进入广州；返航时亦须经屯门出海<sup>[1]</sup>。

生活在香港地区的人们，除从事经常性的农业生产外，还从事采珠、制盐、制香以及航海等生产活动。五代南汉后主刘鋹时，曾有大批人被招募来从事水下采珠劳动。宋初，香港地区有 10 多个盐场，有大量盐民在这里从事制盐劳动，年产盐达 2.4 万多石，远销本省、桂北和赣南一带。宋以来，有邓、侯、廖、文、彭五姓的群众相继从外地迁到香港地区定居，创基立业，繁衍生息，称为“新界”五大族。明朝万历年间，邓代后裔邓元勋已成为富甲一方、拥有良田万亩的富豪，其所拥有的田地遍及香港岛各处。道光二年（1822），九龙侯王庙所立《重修侯王古庙碑记》上，详细开列出赞助者姓名，其中店铺名便有上百个，可见香港地区当时确已相当繁盛。

至于香港岛，从来就不是荒凉之地。很久之前，人们已经在香港岛蕃衍生息，从事农业、渔业以及航海等生产活动。康熙年间，清政府曾派兵驻守香港岛，同时鼓励外地人迁到岛上居住，准其缴纳地税，领地耕种。这样，迁到岛上定居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更源源不绝了。至 1841 年上半年，香港岛人口已有六七千人，分布于岛上 15 个村庄和一个市镇中。港岛南部的赤柱是全岛的中心，是一个拥有 2000 人口的市镇<sup>[2]</sup>。

远在 1843 年英国正式占领香港以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寻找和开拓新的殖民地市场过程中，特别是把中国视为其掠夺和宰割的重要对象时，已在包藏祸心地注视着香港这一宝岛了。早在 1637 年（明崇祯十年）英“伦敦”号船长威代尔在率领武装商船来华活动过程中，便曾蓄意在珠江口外寻找一些岛屿，准备日后作为其居留地之用。在一幅 1780 年的英国航海图上，已对中国南部海域作了相当精密的测绘。香港、九龙、大屿岛、南丫岛等地名均已标在图上。1806 年（嘉庆十一年）至 1819 年（嘉庆二十四年），东印度公司测量员霍士保曾奉命对香港海域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后来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强调香港是一个避风良港，具有重要价值。1816 年阿美士德奉英国政府之命来华活动时，又曾对香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来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到香港地理环境良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1833 年英国下院开会期间，一些人公然鼓吹英国政府应将香港夺取到手里，使之成为一个脱离中国政府管制的贸易中心。翌年，英外交大臣巴麦尊训令前往广州任首任驻华商务监督的律劳卑，要其“在珠江口一带寻找一个适当的港口，准备日后作战争之用；必要时可使用武力”。律劳卑后来致函巴麦尊，正式提出了英国应派兵夺取香港的主张。英国政府经过一再考虑，乃决定将目标定在香港。在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主持下，英国侵占香港的政策，便由计划阶段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的阶段。1836 年，义律继任驻华商务监督时，大量英船经常在香港和九龙尖沙咀一带活动，私自在香

港建立居留地；一些武装船只还经常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活动。

1839年，林则徐奉清朝政府之命，前来广东查禁鸦片。他实行了坚定不移、大刀阔斧的禁烟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禁烟决心，沉重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表明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鸦片贸易，乃积极准备发动一场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更加紧进行夺取香港的阴谋活动。同年8月，一批英船开到香港，随船而来者在岸边居住下来，作“永久居留”之计。英国人自己供认说：“初时不过作暂时之计，但是到了林则徐施行强硬政策的时候，其势不得不在政策上，决定以香港为永久居留地。”<sup>[3]</sup>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更以香港为其“总站”，将英舰集中于香港，以发动侵略战争。

由于林则徐率领广东军民早已严阵以待，因此英国侵略者不敢贸然进犯。英舰在香港逗留了20多天“一筹莫展”，乃于6月底离粤北上，沿途犯厦门，陷定海，于7月底进犯大沽口。在英国侵略者武力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办理与英交涉；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撤职查办。义律与琦善谈判过程中，竟然提出了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琦善对割地一项不敢答应。义律不肯罢手，下令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后，再威胁琦善就范，并于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炮制了一个包括割让香港及赔款等内容的“协定”，即所谓“穿鼻草约”，强迫琦善接受。

但琦善始终不敢答应，亦未在“协定”上签字或盖关防。英国侵略者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竟于 1 月 26 日悍然用武力正式强占了香港岛，旋即在香港岛举行了占领仪式。此时英国对香港岛的侵占，比日后《南京条约》的签订，整整早了一年零七个月时间。

同年 2 月 1 日，义律与伯麦分别以英国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英国驻远东舰队支队司令的身份，会衔发布了英占香港后的第一张布告，无耻地伪称香港已割让给英国，强迫香港居民要“恭顺守法，勉为良民”。

至第二年，即 1842 年 8 月 29 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第三款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英国侵略者对于我国领土香港的武力侵占，这总算是取得了所谓“法律依据”了。

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野心并无止境。它在猖狂侵占香港岛的同时，已在阴谋策划掠夺九龙地方了。

九龙位于新安县九龙半岛南端，与香港岛隔海相望，面积 11.1 平方公里。九龙面山背海，水深港宽，地势平坦，是香港岛的天然屏障，为中国历朝的设防要地。鸦片战争之前，英国船只已在尖沙咀一带海面活动，并经常借故上岸进行阴谋活动。当时林则徐已察觉此事，曾指出“夷船借称避风，辄泊金星门，年来改泊尖沙咀，……今岁（1839 年）占泊甚久，俨有负固之形。……奸夷久聚其间，不惟藏垢纳

污，且等负隅纵壑；若任其踞为巢穴，贻害遏可胜言”〔4〕。

1840年底，琦善奉命赴粤议和期间，在义律胁迫下，竟然撤除了九龙一带的防守设备。然而当尖沙咀附近的“惩膺”、“临冲”两炮台刚一撤除，义律却立即秘密地占据了这里。1841年1月英国侵占香港后，同年9月19日又进一步占据了九龙炮台〔5〕。英国侵略者在此加紧进行营造，“英人在尖沙咀修建营房炮台，均有洋官带领洋兵驻守”〔6〕。

1860年3月初，在未经中国政府任何形式许可之下，英国侵略军1万余人在侵华英军司令格兰特率领下，强行在九龙尖沙咀登陆，驻军宿营，实行武装占领。3月下旬，英国殖民主义者玩弄所谓“租借”手法，胁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租借“协定”，答应将九龙南端由尖沙咀到油麻地的4平方英里地方，永久“租借”给英国，作为军事据点。

然而，“租借”九龙还远不是英国侵略者的目的。此时，英国政界和军界又在鼓吹什么“占领九龙是绝对必要的”。同年7月，英外交大臣密令侵华军头目额尔金，说英女王政府已经获悉巴夏礼从中国获得九龙的永租权此事，“在考虑全部情况以后，认为很有必要获得九龙半岛的完全割让。为此训令阁下，务必努力达到此一目标”〔7〕。同年10月24日，清政府又被迫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英北京条约》，答应将九龙司地方一区割让给英国。“条约”第六款说：“大清大皇帝定即将该地（按指九龙司地方一区）付与大英大君主，并历后嗣，并归英属香港界内，以期该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1861年1月19日，英国侵略者在九龙举行

了一个仪式，宣布接收九龙这样，英国侵略者经过了强占——租借——割让的手段，又把对我国领土九龙的掠夺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然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领土的侵略野心，决不会因侵占了九龙而终止此时，英国又在图谋夺取“新界”地方了

“新界”位于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周围的 100 多个岛屿，面积为 975.1 平方公里。1864 年，英军未得中国政府同意，私自扩充地界至深水埗地方。这是英国对“新界”蚕食的开始。在此期间，英国政界、军界又一再要求英国政府夺取整个九龙半岛，并扩充到北面山岭以及附近一带岛屿。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清朝军队在中日之战中失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疯狂地侵略中国，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军事基地，又一次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就趁此时机将夺取“新界”的阴谋付诸行动了。

1898 年，英国借口法国租借广州湾，对香港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亦要求中国政府答应租借九龙半岛作为军事基地，以示“抵制”其“威胁”；同时提出了扩展九龙租借地界等几项要求。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屈服，由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字。《专条》规定：“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

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再行划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按《专条》规定，租期 99 年，从当年 7 月 1 日起算，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期满。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这一大块土地，原来是没有一个总的地名的。根据《专条》，这次展拓的地界叫做“新界”，此处也就统称“新界”了。

以上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侵占我国神圣领土香港的过程。

英国侵占香港后，利用香港地位重要、交通便利等十分优异的环境与条件，刻意经营，使之成为远东的商业中心。英国于 1841 年 1 月占领香港后，6 月间便即宣布为自由港；《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 年 4 月 5 日，英国正式宣布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港英政府也同时成立。1841 年 10 月，义律将维多利亚湾划出濒海地段，公开进行拍卖，鼓励各方面前来香港投资发展。一些大洋行，特别是与鸦片走私有关的洋行纷纷从外地迁来香港，建立立足点。如英颠地洋行、仁记洋行、赫德洋行、福利洋行、怡和洋行等，均先后在香港建立其办事处。至 1843 年，香港已有英国的大公司 12 个，印度人的大公司 6 个，小型的英国独资商店 10 个<sup>[8]</sup>。

香港经济在其前期发展过程中（1860 年前），主要通过鸦片贸易和贩卖人口等途径来牟取暴利和积聚财富。如在输送中国移民和贩卖人口过程中，香港的船舶业资本家便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1851 年香港先后有 44 艘船只从香港出发，运送移民和被贩卖的奴隶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便从中获取

了 150 万美元的运费<sup>[9]</sup>。1860 年后，英国各大洋行将其所积聚的财富，对香港有关重要经济部门进行投资，刺激了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运业和造船业是香港经济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两个部门。英国洋行对香港的早期投资便是从这些部门开始的。如于 1865 年设立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和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就是最早根据香港法规成立的两个公司，以后各个行业的公司、企业也相继成立。

例如，在海运方面，太古洋行于 1873 年设立了中國航業公司，怡和洋行于 1881 年成立了中國印度航運公司，德忌利士洋行于 1883 年設立了德忌利士輪船公司，仁記洋行于 1883 年設立了麥氏輪船代理公司，天祥洋行于 1889 年設立了聯合汽船公司，等等。在造船業方面，太古洋行于 1908 年和 1909 年分別設立了太古船塢機器公司和白利船塢。在倉庫和碼頭方面，怡和、沙遜、天祥等洋行聯合創設了香港九龍碼頭倉庫公司，太古洋行設立了荷爾特碼頭，中國安全保險倉庫則于 1898 年設立。在工業方面，怡和洋行于 1887 年設立了青洲水泥公司，太古洋行于 1894 年創設了太古制糖公司，旗昌洋行則于 1884 年設立了香港繩索製造廠。公用事業方面，怡和、旗昌洋行聯合創設了香港電話公司，怡和、沙遜、和記洋行于 1902 年創設了香港電車公司，仁記、怡和、沙遜洋行于 1889 年聯合成立了香港電燈公司，天祥洋行于 1898 年設立了天星輪渡公司 坎富利兒女公司則于 1885 年設立了山頂纜車公司。此外，怡和洋行先後設立了香港火災保險公司和廣東保險公司，怡和、仁記等洋行

于 1877 年设立了香港牛奶冰厂，坎富利公司于 1884 年成立了屈臣氏饮料厂，等等。

英国资产阶级通过所办公司企业，从中获取了说不清的利润，而港英政府则通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从中榨取了巨额的税收。如 1846 年香港税收仅为 27046 英镑，至 1860 年时增至 94182 英镑，1864 年时再增至 132884 英镑。1898 年港英政府的收入为 2918159（两），1907 年激增至 6602280（两）<sup>[10]</sup>。随着香港的日益繁荣，香港的人口也年年增加。1841 年 5 月英国占领香港岛时，香港岛的人口约 7000 人，1858 年增至 75000 人，至 1906 年已增至 319803 人，其中华人占 96%<sup>[11]</sup>。

总之，在香港不断繁荣兴盛的景象掩盖下，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从香港攫取了惊人的利润，积聚了说不清的巨额财富，把香港当成其发财和享受的乐园。另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为在香港维持他们的统治，不断强化其统治机器，炮制了一整套的法律，设置了监狱，建立并一再加强了军警力量，强迫香港地区的中国人民当其“顺民”。劳苦工人群众还饱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再一方面，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香港肆意藏污纳垢，收罗各种反华侵华分子，采取各种侵华措施，同时大肆宣扬西方的文化道德思想，把香港变成为不断从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国的基地。香港广大华人为了捍卫民族尊严和生存权利，被迫奋起进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这样一来，中国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也就随着香

港殖民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同时兴起。这是抹煞不了的铁的历史事实。

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所谓“租借”的手法夺取广州沙面的事实，也是值得在这里提及的。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广州已有十三行之设置。这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凡外商来华经商，必须通过十三行商进行交易，不准与任何中国商人发生直接买卖关系。十三行设在今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还附设商馆（夷馆），主要为外商提供住宿、办理商务和放置货物的地方。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华“经商”时，便往往以十三行为据点，进行刺探情报和策划侵华等勾当。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殖民主义者要求对广州享有“进城权”，但遭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1856年英法侵略者借口“亚罗号事件”，联合侵入广州，烧毁大批民房。广州群众对侵略者的暴行愤恨万分，因而纵火烧掉了十三行。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再次攻占广州后，要求清政府答应租借城外西濠口地方，建筑商馆，供他们活动。广东巡抚毕承昭以西濠口居民很多，不便搬迁为由，答应另拨“中流沙”河滩地方，即现在沙面地方，填筑成一小岛，供其使用。由广东当局负责沙面河滨地基的填土工程，费用约26万两，从英法两国勒索的所谓“赎城费”中扣除，由海关代付。地基填埋工程竣工后，再租借给英法两国。沙面岛面积共55英亩（约合334亩）。英占44英亩（约合267亩），法

占 11 英亩（约合 67 亩）。1861 年 9 月 3 日，两广总督劳崇光被迫与英国签订《沙面租界协定》，规定将“沙面的清国政府所有一定土地，贷与英官宪”，“尔后英国政府对中国政府于本协定施行日起，每于第十二个月杪须缴纳制钱一千五百文的年租，准许英国政府为上当（述）目的永久使用。英国政府苟若缴纳总数三十九万六千文之前志租地金而得宁静维持，则中国政府须放弃对该地之一切权利”。就这样，英国殖民主义者以所谓“租借”名义，支付极其低廉的租金，并要中国政府“须放弃对该地之一切权利”，便将沙面夺取到手里。

英法侵占沙面后，立即大兴土木，进行经营。英方将英租界部分划成 82 区，其中大部分向在粤外国人出售，当即获得巨额利润；其余部分作修建领事馆、教堂等之用。法国人也随即极力经营法租界，建造各种建筑物，并将一部分空地拍卖。英法租界当局除兴建洋楼馆舍等建筑物外，还相继兴建了电力厂、自来水厂、水塔、邮政电报局、医院、消防、清洁等公用设施机构。而各银行、洋行、企业等也相继迁到沙面设立公司、办事处、代理处和分厂、分行等。如英资汇丰银行于 1880 年在沙面设立机构，太古洋行于 1881 年于沙面设立机构。1883 年英怡和轮船公司在沙面设立广州分公司。经营销售石油产品的英资亚细亚火油公司于 1906 年在沙面设立机构。美资美孚火油公司和德士古洋行则分别于 1894 年和 1915 年在沙面设立机构。日资台湾银行于 1907 年在沙面成立了机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日资三菱洋行等洋

行、公司也相继到沙面设点。此外，太古轮船公司、日清轮船公司、三井轮船公司、屈臣氏药房及汽水厂、英美烟草公司等洋行公司也先后在沙面设立机构，发展其业务。丹麦大北羽毛有限公司则于 1913 年在广州大沙头地方设立了大北羽毛厂。

值得指出的是：外国殖民主义者除了利用沙面租界作为向中国人民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基地外，还把沙面作为向中国人民进行文化思想侵略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破坏、镇压中国革命的前哨据点，迫使中国人民奋起进行不懈的反抗斗争。

## 第二节 深受重重压迫剥削的广东工人阶级

我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早于我国资产阶级，是首先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经营的企业中产生出来的。广东是我国产业工人最早的诞生地。广东第一代产业工人也是最早出现在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里。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逐步侵入我国。他们在以商品输出作为主要经济侵略形式的同时，也开始在中国直接投资和经营航运、船舶修造业及其他一些加工业。广州是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外国资本主义就在广州一带进行经济侵略活动。

1845 年，英国人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了一个船坞公司，

修理船只。这是外资在中国境内非法经营的第一个企业。50年代后，黄埔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外资船坞公司，如英商于仁船坞公司及美商旗记船厂等。1863年，另一些英商合资收买了柯拜船坞在黄埔的全部设备，成立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雇有中国工人约1000名<sup>[12]</sup>。再加上其他船坞，70年代黄埔地区约有中国工人2000名左右<sup>[13]</sup>。这就是广东地区、也是全国的第一代产业工人。

正如上述，自从英国侵占香港后，便着力把香港经营为世界性的贸易港口和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他们投资经营，首先从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开始。1843年，英人榄文在香港兴建了一个小船坞。以后，其他外商也陆续在香港兴建船坞公司。到60年代中期，外资船舶修造公司共有9家；7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8家。1876年，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放弃了在广州黄埔的企业，而把力量集中到香港，并逐渐吞并了其他船厂，垄断了香港的船舶修造业。该公司所雇中国工人，经常达到2500人，旺季时更增至4500人<sup>[14]</sup>。

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来往船只不断增多，更加刺激了香港船舶修造业的发展。除了外资继续投资外，华资也在香港经营了一批规模较小的造船厂。香港造船业的迅速发展，使造船工人队伍日渐壮大。据一篇文章称：“（香港）各造船所约有劳动者一万二千余名。”<sup>[15]</sup>另一外国著作称：1925年“省港大罢工前，香港造船业工人不少于五万人。”<sup>[16]</sup>仅黄埔船坞便有4000名<sup>[17]</sup>。

航运业是外资在香港经营的另一重要行业。1842年，

英怡和洋行派“哥萨克”号轮船开辟了香港——广州间的航线。1865年，航行于香港、澳门和广州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在香港成立。19世纪60年代开始，外资在香港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航运公司。大批来自广东各地农村的破产农民、船民和手工业者被招雇上船做工，成了中国第一代海员工人。1920年，香港海员“约有二万五千人”<sup>[18]</sup>，加上一二万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的海员，合共4万人左右。

70年代以后香港加工工业、轻工业和公用事业等方面，也不断发展。如制糖、纺织、水泥、绳缆、制冰、造纸、电力等企业及码头、仓库等，都相继在香港创立。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大致上规模都较大，多是使用新式的机械生产，因而都各有一批工人在里面做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华商也开始在香港经营纺织、火柴、烟草、化妆品、罐头、玻璃、造纸等轻工业。上述中外企业的陆续兴办与发展，无疑使香港地区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如80年代太古糖厂通常雇用工人数百人，至90年代初已增至1500~2000人<sup>[19]</sup>。中华火车糖局在90年代中期有工人300名<sup>[20]</sup>。80年代时青洲水泥公司拥有工人两三千名之众<sup>[21]</sup>。1886年成立的香港九龙码头仓栈公司，于90年代末期雇用工人800名，至20世纪初增至1500人<sup>[22]</sup>。在香港，机器行业的工人达1万名（内一部分与造船工人人数重复），织造女工约1万多人<sup>[23]</sup>。华资开办的南洋烟草公司有工人4000余名<sup>[24]</sup>。码头工人有数千之众，建筑工人约1万人<sup>[25]</sup>。电灯、电车等公用事业工人不下数千人。